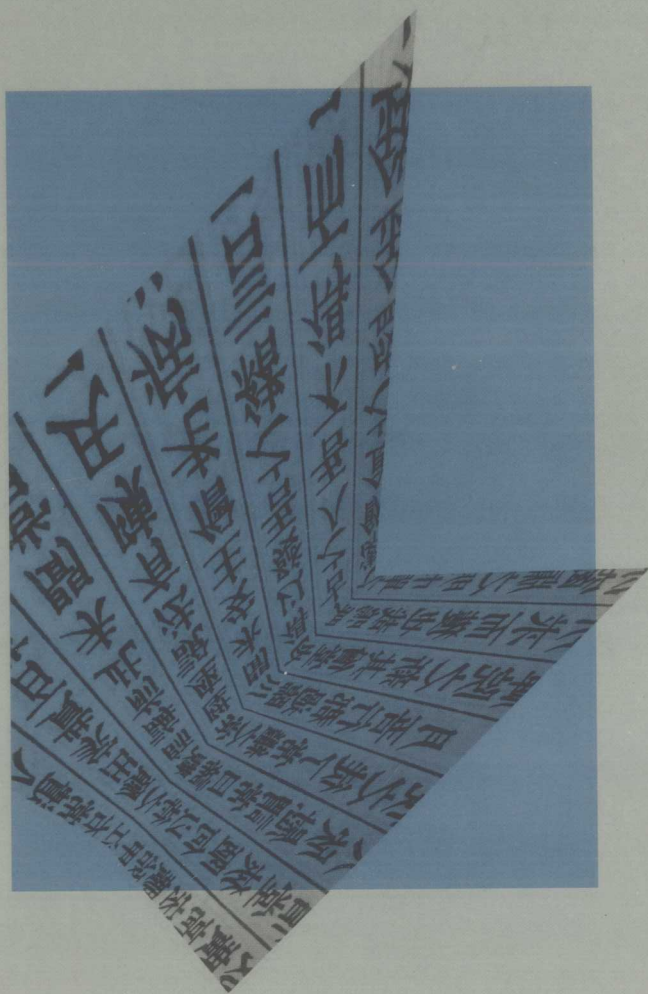


浙東文化

Eastern Zhejiang Culture



2002 2

宁波市文物
考古
博物馆
学会
会刊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二〇〇二年第二期（总第十八期）

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会刊（半年刊）

主编：董贻安

编辑出版：宁波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会

地址：宁波市解放北路91号

邮编：315010

电话：0574-87349941

封面题签：启功

封面设计：蒋华

印刷：浙江省宁波银行印刷厂

浙内图准字（2002）第136号

<http://www.nb7000.net>

E-mail:nbww821@cmb.net

2003年3月出版

目 录

四明史籍导读

编者按

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和全谢山的《宋元学案》 钱 穆(1)

浙东学术研究

黄梨洲恢复证人讲会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郑吉雄(16)

《鮑琦亭集》内外编之由来 刘孔伏(44)

清代浙东学派与藏书文化 虞浩旭(49)

一代国史托布衣——黄宗羲、万斯同与《明史》编纂 褚焕灿(59)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清代前期开海设关的历史地位与经验教训 黄国盛(71)

普陀山高丽道头遗址寻觅 王连胜(104)

在日本翻刻的宁波《中外新报》 谢振声(120)

古籍与文献

《香消酒醒曲》校记 骆兆平(124)

从《自赞》看范钦对人生旅程的自我总结和评价 袁 慧(126)

天一阁新增碑碣拓片述略 谢典勋(134)

考古新发现

宁波元代庆元路永丰库遗址发掘简报
.....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40)

文物研究

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始末 骆兆平(147)

关于海底的文化遗产漫话(之二) 王 军译(157)

从海底射出的中国瓷器之光 黄时鉴(168)

别有斋捐赠器物类文物概述 李 军(183)

越窑青瓷研究

越窑瓷器与地理人文环境 施祖青(195)

谱牒研究

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 葛剑雄(210)

妈祖文化研究

妈祖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意义 尚 洁(219)

妈祖信仰与民间戏曲发展的关系 许 平(226)

甬上人物研究

对南宋史嵩之联蒙抗金的新评价 杨成鉴(237)

普陀元山岛并非张苍水被执之地 张利民、郑松才(244)

学术动态

2003年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着手筹备 (254)

宁波市举办纪念万斯同逝世三百周年学术座谈会 (254)

出版消息

《辉煌的历史名城——宁波文化遗产解读》即将编撰完稿 (255)

《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图录》编印发行 (255)

文博简讯

天后宫推出“庆安之夜”(48) 宁波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永丰库遗址保护(70)
《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摄影展》亮相大方岳第(103) 《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再次全面修编(119) 《妈祖与中国红》陈列开放(123) 宁波市举办《文物保护法》大型广场文艺宣传活动(133) 我国著名专家高度评价永丰库遗址考古价值(146) 宁波全面启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156) 宁波市民共享“海丝游”“名城游”(182) 天一阁敞开心扉让游客品读(194) 白云庄浙东学术文化陈列开放(218) “海上长城”镇海后海塘再现雄姿(225)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考察我市文物工作(236) 宁波五万市民争睹元代永丰库遗址(243)

征稿启事(256)

封2:第二届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周集锦

封3:宁波明清藏书家藏书印选赏

责任编辑、校对 赵维扬

编者按：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蔚为壮观。康有为、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陈寅恪、钱穆、冯友兰……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重开新风而成绩斐然；他们对经、史、子、集博学宏通，立学术之本在我中华，从而广开现代风气之先；他们各具鲜明的学术个性，独具魅力的人品文章，皆为不同学科的宗师。他们的学术成就惠及当今，对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的学人来说，不仅是学海中的航标，更是一个最佳的学术楷模。为了弘扬浙东学术，宣扬宁波历史文化以浙东学术为核心，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线的个性特征，本刊自这一期起，将设专栏陆续选载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就宁波历代史籍、名著的评价导读文章，旨在为当今甬上后学提供学习、借鉴大师们治学的博大胸襟和高深学识的风范。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执教，曾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美国耶路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著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国学概论》、《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七十余种。

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和 全谢山的《宋元学案》

钱 穆

我讲宋代，已经讲了好几部书，实大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还可说是宋代史学传下。现在要讲到明代。明代人在学术方面，比较汉、唐、宋各代都要差一点。中国这几个大一统的朝代，

汉、唐、宋、明，论到学术，惟明最差。这虽没有人详细讲，但显然是事实。我从上讲来，汉、唐、宋三代都有他们学术长处，但又多不同。为何明代又要比较差？这些处，都是我们自己读书应该注意的大问题。固然我们立刻不会能有答案，也不容易下此一答案，但此问题总不应该不留心注意到。

此下我们讲明代，我想特别只举出一部书，即是黄梨洲（宗羲）的《明儒学案》。实际《明儒学案》已不是明代的书，此书在清代才完成。这样讲来，我就在明代想不出举哪一部书来作史学名著讲。其次，诸位或许会认为《明儒学案》是一部理学书，用今天话来讲，是一部讲哲学思想的书，不是一部史学书。这观点却是要不得。今天我们做学问，都跟着西方人道路，都要讲专门之学。可是诸位读的是中国书，由读中国书来做外国学问，这中间也很困难。如读《论语》，《论语》究竟是一部哲学书呢？还是文学书呢？还是史学书呢？很难定。今天诸位倘使是学文的，当然不读《论语》，因《论语》不算一部文学的书。又如学史学的，也不会读《论语》，诸位总觉得学史学，孔子《春秋》应该看一看，《论语》便不要看。似乎只剩下要讨论中国哲学思想的人，才来读《论语》，但我得告诉诸位，诸位究竟还没有脱离了中国的，而且此下也将还在中国，做一中国人，乃至一中国学者。如诸位要讲中国历史而《论语》一书都不曾读得懂，此人的史学知识，可能是浅之又浅，或许早就可说不会有很大的价值。所以若我们一定要把学问分疆划界，指定这是史学、这是文学、这是哲学，这样一分的话，如韩信军入赵营，拔赵帜，立汉赤帜，赵营早破，不能再存在。所以诸位要觉得我今天讲史学名著而

来讲到《明儒学案》，似乎有些奇怪，其实《明儒学案》也可说是一部中国的学术史。讲历史本有多种讲法：一种是讲通史，一种是讲专门史。如我们讲《通典》、《通考》，这是讲政治制度的一种专门史。《明儒学案》则是讲学术思想的一种专门史。但今天诸位则认为，学历史不能不懂政治制度，不能不看《通典》、《通考》。却没有想到学历史也该懂得经学理学这一类。如诸位读两汉书而不懂得经学，这就非常困难。至少诸位读明史而不懂得《明儒学案》，也就很困难。《明儒学案》就是讲明代一般学者的思想。诸位纵不想做一通人，一意要做一专家，但在你所专之内总该通。诸位若专治明代史，而不懂得《明儒学案》，岂不在专中仍有缺。

其实中国历史的正史，从司马迁《史记》开始，本是无所不包的。只要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里产生过大的影响的人物与事情，那都在他历史上记载下来。如《史记》、《汉书》里有《儒林传》，凡属经学儒学这一方面的人和事和著作，都特别收在《儒林传》里边。《后汉书》以下又有《文苑传》，凡是关于这一时期文学方面的人也收在这里边。那已经是有了学术史的雏形了。但中国的学术史，反而在佛教方面，好像最先具有了一种规模。为何呢？因中国正史里不记载佛教方面的事情，因而才有单独来写出的需要。如我上面为诸位举到魏晋南北朝以下的《高僧传》、《续高僧传》，一路下来，等于是一部佛教史，也就是专门学术史的一类。更特别的，是在佛教中间的禅宗，自唐以后，所谓教外别传，他们自己创立了一种说法，不立文字，递传递盛，派别分歧，更显得有为他们写一种禅学史的需要。最著名的如《传灯录》，禅宗各祖师思想的传授、分

派、分宗,都在这里。我们也可说,宋代理学受了禅宗很大影响,至少如宋代理学家的“语录”,便是从禅宗祖师们的语录转来。要讲二程思想,最重大的材料,就是他二人的语录。周廉溪、张横渠还自己写书,但他们所写也都是一条一条的。虽然多用文言写,其所写也就是语录的体裁。只不过由他们自己一条一条地写下而已。而二程的语录,则显然是白话的,又不是自己写,而由其门人弟子记下。这种语录,当然起于唐代的禅宗。所以我们绝不能说宋代人的理学和唐五代的禅宗没有关系。但我们也不能换一句口气,说宋人的理学即是佛学,或即是禅宗,这话又根本不对。但我们也不能说理学是讲孔孟儒家思想的,和佛家禅宗绝无关系。可见一切学问不能粗讲,应该有个仔细的分别,此所谓“明辨”。

今说到学案,其实“学案”两字,也就是禅宗里边用的字。语录起于禅宗,“学案”也是起于禅宗。明代人第一个最先做的学案,叫做《圣学宗传》,写这书的人是周海门,周海门就是一个学禅宗的人。从周海门的《圣学宗传》下面继起有孙夏峰的《理学宗传》。此两书都在黄梨洲《明儒学案》之前,《明儒学案》则是接着此两书而来。此两书,我们现在都还看得到,但我们大家读的只是《明儒学案》,《明儒学案》的价值远超在《圣学宗传》、《理学宗传》这两本之上。《明儒学案》前一共六十二卷,他在材料方面搜罗极广,比之周海门、孙夏峰两书广大得多。到今天,有好多明人的集子已经不容易看到,我们读《明儒学案》,就可以看到很多。

明人讲学,一家有一家的宗旨,其实这也都是跟着禅宗来的。讲学有一个“宗旨”如王阳明讲“致良知”,这“致良知”三字,就是阳

明讲学的宗旨,这就是他思想系统里一个最中心的地方。后来阳明的许多弟子,各人讲学,还是各人有一个宗旨。《明儒学案》的有价值所在,就在他能在每一家的集子里提出他一家的一个讲学宗旨来,这是极见精神的。固然,明人讲学各有宗旨,但我们也可说从前人讲学一样的有他一个宗旨。如墨子讲“兼爱”、杨朱讲“为我”,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要能知孔子所讲宗旨是什么、老子所讲的宗旨是什么、庄子所讲的宗旨是什么。像此之类,你要对每一人所讲,都能找出他一个最扼要、最简明的宗旨,是一件极重要的事。那么,第一,《明儒学案》能对明代各家各自提出他讲学的一番宗旨,那是一件极重要当注意的事。

第二点,各家讲学,各有一番宗旨,也就是有其某种一偏之见。或许他的这番一偏之见,正和别人的处于相反之地位。如我们说,扬朱为我和墨子兼爱,各是一偏,又是相反。但学问成家,此等处总不能免。即是明儒讲学,他们虽人在理学的传统中,只要他们成了一个“家”,依然免不了各占一偏,或各自相反。而黄梨洲在他们的全部著作里,各为他们找出各自的精义,不论是一偏的,或是相反的,他都把来写进他的《学案》里去,这是《明儒学案》最了不得的地方。

后来有人为《明儒学案》作序,如莫晋刻《明儒学案》写了一篇序,这已经在道光时候了。他在序上说,《明儒学案》“言行并载,支派各分”。记载了一个人,不仅记载他的思想,同时还记载他的行事。而每一家的思想又为之分家分派,“择精语详”。说他所选材料很精,而所发挥又很详。诸位要懂得这“择精语详”四个字,初看

好像是不同,实际只是一个意义。选择不精,你就无法讲的详。要讲得详,就先要选择得精。如我此刻同诸位讲“史学名著”,倘使我不加一番选择,光是二十五史、十通,一年哪里讲得完。所以择不精就语不详,讲学术史也一样。凡是我们对于每一家的学术思想,不能从头到尾滔滔不休。我们须要能“提要钩玄”,就是择精语详了。所以我们读了《明儒学案》,能对“一代学术源流,了若指掌”。莫晋如此般讲《明儒学案》,可以说他一点都没有讲过了分。我们要研究明代一代的理学,就得看这部《明儒学案》。在清代雍正时,汤斌有一句话,说“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山,脉络分明”。诸位当知,每一代的各家学术,正如一堆大山耸峙在那里。我们要在这一大堆山里分出个脉络,清清楚楚,这非对此一堆山的形势真有所了解不可。我们治学术史,首贵有见解。如讲古代学术,定要讲《汉书·艺文志》。它在那里讲王官之学与百家之言的分野,在百家之言里又分出儒、道、名、法、阴阳、墨各家,这许多非刘向刘歆能如此加以一大分别,我们就很难弄清楚。

诸位要读《明儒学案》,最好能读《明儒学案》以外的书。如读了《王文成全书》,再来读《明儒学案》中之《阳明学案》,便知其所谓择精语详者是什么一回事。最好又能读《明儒学案》中所未收各集,便更知其所谓择精语详者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我们来读《明儒学案》,不仅是知道明代一代的学术思想,即使我们并不是要做学术思想工作的人,读了这书,也就懂得像如现在诸位所讲“如何来驾御材料”这一回事。一大堆的材料放在这里,都是死材料,如何来驾御,使其活起来,如一个大将带兵,如何来统率三军,能叫

他们上阵杀敌。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军队一多，更难带领。诸位只知要军队多，不知多了更难办，至少你要有一个编排。今天我们读书，仅求在一部书里找一个小题目，然后支找很多材料来讲这个小题目。这样的学问，至少是一种小学问，诸位只能做排长、连长，不能做师长、军长。我们做学问，要能从一大堆材料里面来支配、来调度，约略等于说是由博返约。讲历史不能截断讲一段，我讲汉史、你讲唐史，在一段里面再讲一件事，我讲汉朝某事，你讲唐朝某事，拼起来并拼不成一部中国史。我们要能见其大、能见其全。要如此，便该读从前有此见识的人来写的书。纵是你只要做小学问，也该在学问大处去接受领导。如排长连长必须接受师长军长的命令，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有正当之使用。

当然黄梨洲是一个讲阳明之学的。他的《明儒学案》只以阳明为中心。但我们也不得认为这是他的偏见，或者说他的主观。因明代理学本来是以阳明为中心的，恰恰梨洲是这一传派，他的书当然以阳明为中心。既非偏差，而由他写来，也能胜任。如诸位研究清人的学案，那就一定该通考据学，一定该通经学考据，因清代学术最重要的成就便在此。你若不通经学考据，如何来讲清代人的学问？所以《明儒学案》偏重王学是应该的。

在学案里，每一学案前有一篇“小序”，每一学案中许多家，每一家各有一篇“小传”。在这小传的后面，定附梨洲自己对此一家的批评。即在他学案里，也随时插进了几句批评或解释。这些都是梨洲的意见。所以这部书固是一部历史，是一部叙述的书了。然而里面不断有论断、有批评，不断有梨洲自己意见穿插。而梨洲

意见即是根据着阳明学派的意见为意见的。梨洲说：“古人因病立方，原无成局”，讲学著书，也就等于一个医生开方治病，要看什么病，才开什么方，哪有一定的方案。所谓“学案”，亦就是在当时学术中各个方案，都因病而开。梨洲又说：“通其变，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虽一而不得不殊，入手虽殊而要归未尝不一”，这是说，时代变，思想学术也该随而变。所以要变，乃为来救时病。反其本，则只是一个真理。这几句话，我觉是讲得非常有意思。即如今天诸位做学问，也该反问一句我如此做学问有没有毛病呢？诸位一跑进史学研究所，便把文学、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各门，全置脑后，认为都同我不相干，全无兴趣，更不动心。以前孟子四十而不动心，今天诸位一进学校便就不动心。《论语》、《孟子》、程朱、陆王，想来诸位不肯读，因对你们想求的学问没关系。在这一层上，我要告诉诸位，这就是今天学术界一个大毛病。我们也应该要“因病立方”。曾有人和我讨论我所写的《国史大纲》，他说：你书中只多讲中国好处，不多讲中国坏处。我说：你们大家尽在那里讲中国坏处，我不得不来多讲一些中国的好处。而且中国坏处在我书里不是没有，治乱兴亡我都讲，不是只讲治不讲乱，只讲兴不讲亡。但在你看来，好像我都是在讲中国的好处。但请问，我们在汉、在唐、在宋明、在清，各有一段治平极盛的时候，这些处，我们该不该讲几句呢？我们的历史，直从上古下来，四五千年一贯直下，到今未断，这些处又该不该讲几句呢？今天我们的毛病，在乎再不肯讲自己好处，只讲自己坏处。我请问：我们中国人太坏了，又怎么在此世界做人呢？今天诸位一出口就是美国好、中国坏，我要向诸位

讲一句：美国并非全不坏，中国并非全不好。若说我平生讲话，多讲了中国的好处，也只是因病立方，通其变使不倦。否则尽是说美国好，中国坏，哪个不知？还要我讲吗！诸位懂得要“通其变”，“使人不倦”，那就知教法也该一天天不断向新。近代中国人则只说“中国人守旧！”。其实有了朱子还来阳明，有了宋儒还来明儒，不也是一番新吗？此下再来清儒汉学，则又是一番新。梨洲虽承王学传统，但不抹杀程朱，故说：“理虽一，不得不殊。”

今天诸位纵说美国好，但移到中国来，仍得要殊。梨洲又说：人手虽殊，要归未尝不一。中国人虽讲孔子，与西方人讲耶稣夫子，但何尝不归于要爱人。中国虽自秦以下走上了大一统局面，与西方历史之列国分争，又是人手殊了，但中国人也何尝不归于要讲治国平天下，不是要自求亡国呀！今天由美国人讲美国，中国人讲中国，大家从长处发扬下去，将来还可归一，何必定要灭了自己来归他人呢？做学问也是同样，做人、做国家社会也是同样。不能把中国人一齐抹杀，硬要学外国。做学问也不能把人文科全抹杀，定要学理科。我们看看今天的美国，理科固是比我们的强，至于他们的政治理论，实在有些不能使人心服。诸位要做生意，应可学美国人。要杀人，使用核子武器，也可学美国。至于说打仗，未必美国人便打得好。大炮拼命轰，飞机拼命炸，大队躲在后面不动。南北韩战争是如此，南北越战争还是如此。轰炸几天以后，大队军人休假去了，一跑就到香港，到台北。来了怎样，诸位都知道。有的是美金，吵吵闹闹一番又回去。你说世界上哪有这种军队。但这些我们哪能批评，只不真实效法便够好。下面南北越战争不知演变

如何,但明显可说的,美国人会厌倦,会比北越人先厌倦。正为美国人在那里厌倦,所以有“嬉皮”,所以打仗不高兴,要讲和、要使战争越南化。美国当然也有许多好处,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上多讲几句美国人的不好处,也所谓通其变使人不倦。若尽说美国好,老不变,也易使人倦。但若我们讲了美国人许多坏话,寻根究底,应该要讲到他们的学术思想上去。今天我们的学术界,尤其是文史哲方面,则似乎只想当排长连长,而遥奉外国学人认作我们的师长军长,乃至大统帅。虽然指挥不详明,但我们的箭头刀锋已尽向自己。所以对中国自己的,总是敌意多,善意少,攻击胜过了引发。无怪要说我的《国史大纲》是说得中国好处太多,坏处太少。

今天诸位研究史学,其实也都是美国人一套。但话得说回来,美国一套,其间也尽有可效法的。即如做专门之学,挑个小范围也可以,《明儒学案》不也是在小范围里挑个小题目而成了大著作吗?不是说做学问不该做专门之学,而且哪一人能四面八方兼通。《明儒学案》是我一部很喜欢看的书,实在觉得它是一部很好的书。诸位不要认为不在自己的学问范围内便置之不理。譬如游山玩水,遇有闲暇,不妨一试。我们要能养成一种性情,肯到一个未到的地方,看一番未见的天地,那总好。诸位若能抽出一个时间读一部《明儒学案》,也不失为一种娱乐。要使你能看一点你完全不懂的东西,这也会长本领。乡下人从来不曾进过城,等于一个城里人从来不曾到过乡下。我劝诸位,有空宜去城里逛逛。诸位学史学,我意不妨试读《明儒学案》,就如城里人不妨去乡下玩玩。若能多玩几趟,你这人自然也会慢慢儿变。如此般的通其变,也可使你好学

不倦。

我们讲到《明儒学案》，便要牵连讲到《宋元学案》。《宋元学案》有一百卷，全谢山所编。黄梨洲在写完了《明儒学案》之后，接着又想写《宋元学案》。因明代理学都跟宋代来，他们所讨论的也多是宋代人讨论下来的问题。所以由《明儒学案》往上便应该研究到宋元学案。但黄梨洲写完《明儒学案》已经是七八十的人了。我们不再详细考他此书从哪年写到哪年，但已经是在梨洲的晚年，同时再来写《宋儒学案》，没写多少，梨洲就死了。他儿子黄百家，又接着来写，又有梨洲两个学生：黄开沅与顾颉，相同分辑，但也并不曾完成。到后，就再有全祖望（谢山）来加修补。所以黄本的《宋元学案》是个未成之稿。全谢山的修补，据说得十居六七，是在黄氏原本一大半以上了。但全祖望修补了这部《宋元学案》，也就逝世了。他的这份稿子付刻还在后，担任此工作的有两人：一王梓材，一冯云濠。今本《宋元学案》，皆由此两人审定。全书分成四部分：一是“黄某原本，全某修订”。所谓黄某，是指梨洲百家父子，再加上梨洲两个学生，已经是四个人的工作了。修订是有加以修正改订之处的。一是“全某补本”，此是黄本所没有的。一是“黄某原本、全某次定”，所谓次定，不过是排比次序。一是“黄某原本，全某补定”，这里面便有全氏的增补。在每一卷下，均由此两人来分别注明这几个字。但我们今天说来，只说是“全祖望的《宋元学案》”，不能称“黄梨洲、黄百家的《宋元学案》”，也不能称“王梓材、冯云濠的《宋元学案》”。但这书经过，实际上并不是一手所成。梨洲死在康熙乙亥年，而谢山死在乾隆乙亥年，前后恰恰已经六十年。《明

儒学案》在梨洲死的时候也还没有刻本，梨洲死后，始有一部“贾刻本”，距梨洲死已十八年，此在康熙时。后来又有一部“郑刻本”，在乾隆时。从贾刻本到郑刻本，中间也隔了十六年。梨洲死到有郑刻本，则已经过六十四年了。我们现在都用的郑刻本，贾刻本怕有许多靠不住，他把梨洲原本有调动了，至少第一卷第二卷先后次序凡例有调动。全谢山死在乾隆二十年乙亥，自从乾隆十一年到乾隆十九年，八年时间，几乎是不断地在修补《宋元学案》。到了二十年谢山死后，他的稿子留在某一人的家里，后来有一学使去谢山家乡，问起从前谢山有一部《宋元学案》的稿子在不在？那时有两个考生，即是王梓材、冯云濠，听了这个学使问起，才来查究这稿子。找到了拿来刻，已经是道光十八年，距离全谢山死已经八十四年。而王梓材、冯云濠两人又来作《宋元学案》的补遗。因为全谢山本也是把许多材料来补黄梨洲父子的，他们依此再来加补，此稿在道光二十一年完成，共一百卷。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就是七七抗战那一年，上海光华大学的校长张寿鏞，他是一个银行家，来刻一部《四明丛书》，把王梓材、冯云濠的《宋元学案补遗》一百卷刻进了。这一百卷书，从《宋元学案》刻后到这时，前后又隔了九十七年，差不多近一百年。我讲这番话，要使诸位知道《宋元学案》一书完成经过不简单，不容易。第一，诸位不要认为清代一代就是讲考据之学，实际上黄梨洲《明儒学案》写在康熙时，而全谢山《宋元学案》写在乾隆时。而《宋元学案》之刻本，还是在道光十八年，下面《宋元学案补遗》之刻传，则已经在我们对日抗战时。若我们从《明儒学案》开始，讲到《宋元学案补遗》，这三书专讲宋元明三代理学的，差